

世界海洋日

World Oceans Day

- 今天是第12个“世界海洋日”
- 今年主题：“保护红树林 保护海洋生态”

来到上海东南角的临港,在南汇嘴观海公园西面一大片芦苇荡的湿地之中,只见一垄垄整齐的小树苗正茁壮成长。桐花树、秋茄、无瓣海桑……它们有个共同的名词“红树”,原本生在热带,如今在这里生长繁衍。这个地方有个美丽的名字——“钟扬红树林临港基地”。

百公里外的枸杞岛上,上海海洋大学教授章守宇今天正带着科研团队在水下直播探访海藻场。近两年来,团队集中力量开展了我国沿海海藻场的“摸底”工作,填补了相关数据的空白。

本报记者日前走访了两支高校科研团队,听他们讲述保护“蓝色国土”的故事。

“上海红树林”在滩涂自然生长

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在“海岸卫士”红树林扎根的滩涂,能够形成特殊的生态系统,养活各种底栖动物。吸附氮磷钾,净化海水和空气,只要有红树林在,近海的高营养化污染也能得到大大缓解。

然而,红树毕竟是热带植物,要在较高纬度的上海种植谈何容易?上海原本无红树,更不奢望种植红树。已故复旦大学教授、“时代楷模”钟扬的大胆实践改变了一切。他发现上海曾有红树林,二十多万年前前的化石就是证据,更何况,气候正

在变暖,海水温度升高,植物对环境也有很强的适应性。

2007年,钟扬课题组用卡车从广东珠海运回了总共10种红树实生苗12000株,采用地栽方式在上海临港种下。这是上海的最南端,但还是比原有红树分布界线北移了近3°。严寒、台风,钟扬的红树林研究团队历经风雨,终于获得成功。可是,2017年,钟扬意外离世,项目也因为资金和土地的缺乏而面临中断的危险。在艰难条件下,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南蓬和钟扬助手经佐琴决定把这项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她们说:“钟老师虽然不在了,但他把希望留给我们,一定要守好,要守住。”

接地气调查填补了数据空白

“海上调查和水中婚纱照不一样,一点儿也不浪漫。”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章守宇半开玩笑地说。其领衔的近海栖息地生态修复团队致力于我国近海人工鱼礁、藻场生态学、海洋牧场方面的研究近20年,在相关领域建设上做出了大量贡献。

“天然的海藻场和陆地上的森林一样,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章守宇介绍,海藻场保持了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成

为沿岸的“种质库”。“它还能有效地防止海域富营养化,起到改善水质与海域生态的作用。”

近两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沿海10省市共计60余个重点区域海藻场生态调查,填补了我国沿海潮下带海藻场资料的空白。“大型海藻很多都是一年生,茂盛的时候也就是三至六月,前期海水很冷,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章守宇忍不住和记者“诉起苦来”,“大风来了没法出海,现在‘禁渔’,连小渔船也借不到了。”团队很多老师、学生花了大量的精力在海藻场调查上,放弃了很多写学术论文的时间。

这片蔚蓝我们一起守“沪”

港为城用 城以港兴

- “近代上海城市与海洋的交融”展览今天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开幕
- 从老城厢走向大上海 港口航运发展给上海人们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上海的城市发展与航海带来的全球化密不可分。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港为城用·城以港兴:近代上海城市与海洋的交融”展览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开幕,黄包车、旗袍、月份牌等舶来品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和这座城市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

在近代,上海港因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迅速崛起为中国第一大港,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窗口。自上海开埠以来,上海港不仅是中西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各种文化交流的中心。近百件文物、文献、模型等展品,从“航运、经济、文化、城市建设、市民生活”等多维度展现海洋、航海对上海这座城市产生的深远影响。

人力车从日本引入上海,因车身都涂黄漆或桐油,改称为“黄包车”;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服装,受西式服饰的影响不断修改,成为上海青年女性的主要服装和礼服。这些舶来品或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展现了上海摩登现代的城市风情和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

在展厅,市民提起电话机的话筒,就能听到“嘎三胡、派对、麦克风”等洋泾浜英语的演变全过程。洋泾浜英语是英语与上海话结合的产物,上海话中有600多个词语是洋泾浜英语发展而来。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2日。

2018年夏天,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政府、临港港城集团主动提出为红树林育苗基地提供土地和资金支持,钟扬红树基金也募得不少款项,为后续筛选并保存更适应上海气候的红树植物进行引种试验和种苗培育提供了保障。

更可喜的是,从去年起,这个基地向海堤外扩展了百亩,“上海红树林”实现堤外养殖,开始自然地生长在滩涂上。这离钟扬教授生前的夙愿迈进了实质性一步。

南蓬告诉记者,经过实验室里的反复实验,已经确定了多个改良后红树品种适应上海的气候环境,红树苗基本适应上海冬天的低温。如今,红树的堤外养殖实验正分8块区域进行,进展顺利。

教师王凯还记得,两年前开展水下调查的时候,是被台风“撵着跑”的,有一回是在海上九级风到来之前,匆匆下海完成了数据采样。连渔民都感叹,“你们比我们还要苦”。

令章守宇欣慰的是,多年来的努力已有了回报。团队通过收集的数据,结合资料记载,绘制了全国沿岸海藻大类分布图,并逐步勾勒出各典型区域的海藻场生态格局。“我们的工作看上去没那么‘高大上’,但掌握这些信息能为渔业资源评估和碳汇潜力评估提供重要参考。”章守宇表示。 本报记者 邵阳 张炯强

新民随笔

“野保”姿态该变了

姚丽萍

6月6日,有两件事,很受关注。一件是《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另一件是2020年长江口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而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导向——究竟是生态平衡,还是资源利用?

长久以来,以“万物灵长”自居的人类,保护野生动物,似乎习惯于拿出拯救者的姿态,即便保护也倾向于资源利用。但现实让人明白,要想跟蔚蓝星球一道生生不息,就要拿出敬畏心。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更让人深刻反思野生动物保护的既往偏差。

目前,我国被保护物种累计占我国总记录哺乳类、鸟类、两栖和爬行类动物物种数的62.71%,仍有1077种未受大法保护;其中传播疫病高风险物种,诸如大多数蝙蝠、旱獭、鼠类,是对人类健康威胁极大的病毒天然宿主或中间宿主,然而对其猎捕、人工饲养、利用,仍不能依据野保法有效遏制。

事实上,野生动物兼具资源属性和生态属性,生态系统中,任何动物都有生态价值。比如,珍稀物种消失,一种原因是,其赖以生存的生物链下游“非重点保护”物种被人类利用掉了,断了粮,怎么活?显然,以珍稀、濒危与否而忽

略生态平衡的保护,不仅不合时宜,更不能实现保护初衷。

人对自然的认识在变,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取向,也在悄然变化。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时,更倾向于资源利用式的保护。2016年修订时,立法目的中删除了“利用”内容,明确保护优先、规范管理、严格管理。今年,疫情令人警醒,全国人大常委会拟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加强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源头控制;更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鲜明立法导向——野生动物保护,为生态平衡而非资源利用。

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先行,保护野生动物,更要以生态文明涵养现代法治思维。因此,就不难理解,中华鲟保护,上海地方立法为何要以生态优先、统筹协调、严格监管、社会共治为立法原则。这也是上海第一部针对单一特定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完善了中华鲟抢救性保护的保障和“长江大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体系。

长江口,中华鲟增殖放流,盛况之下,是现代城市文明对大自然的虔诚之心。

疫情最严重时,顺丰上海快递小哥王晓溪连续工作63天

这家医院派件他一人负责

新时代 奋斗者

王晓溪,中共党员,退伍军人,快递“新兵”。从今年1月底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起,他一个人担负起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及3幢医护家属楼的快件收派工作,连续63天,不停不休,“第一人民医院是指定发热门诊医院,可以说也是‘一处战场’,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奋战在一线,我就是往前线送子弹的后勤兵,这个‘兵’,必须当好!”



■ 疫情严重时王晓溪全套防护往医院送快件

1个人干4个人的活

王晓溪来自江苏淮安市,当过8年兵,去年8月才来到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上海区通州分部。今年1月底,很多快递员都返乡过年了,王晓溪决定留守上海,他所在的通州分部(站点),60个小哥只留下13个。就在这时候,新冠疫情肆虐,王晓溪却坚定地对站点负责人彭军说:“我是党员,第一人民医院就我一个人负责吧,减少传染风险。”

每天都有大批捐赠物资及医疗采购物资涌入医院,王晓溪每天要派送400至500件货物,“去年

双十一高峰期王晓溪一天的派件量也就180件左右,相当于他一个人干了4个人的活,太辛苦了。”彭军解释道。

63天怎么扛下来的?同事谭同军说:“他6点就到站点了,常常看到他半夜十一二点还在送件。”同事吕全恩记得:“他忙到没时间吃饭,经常是一边走路,一边往嘴里塞包子。”王晓溪自己则说:“防护服一穿就是七八个小时,上厕所太麻烦。”

王晓溪对第一人民医院的每一批医疗物资都不敢怠慢。有一次,为了第一时间送达50箱防护服、护目镜和面罩物资,王晓溪放弃了电瓶

车,用手推车来来回回跑了5趟,每一趟单程都要15至20分钟。

爸爸是去救命的吗

王晓溪工作至今“零投诉”,这与他为人忠厚、踏实肯干不无关系。疫情严重时,医护家属楼也封闭管理,原则上快递只能送到小区门口,可小区里老人的儿子、女儿很多都奋战在抗疫第一线,这些老人买东西方便吗?电商平台上购买的米、油等重物不方便提到楼上?想来想去,他找到了“工作方法”:送快件时先打电话,只要是老人,尤其送的是重物,就与用户约定送到家门口,放下后离开,再打电话通知用户开门取快递,“这样也能做到无接触递送,当然我进小区,不仅要穿全套防护装备,还要征得物业的同意。”

疫情刚暴发时,正值春节,王晓溪之前接受人和9岁儿子到上海过年,刚开始时,他还不告诉妻子自己专送医院快件,怕家人担心,直到儿子看到他穿着防护服干活,问:“爸爸你是去救命的吗?电视里的叔叔阿姨和你穿的一样!”

“我当然没有那些救命的医护人员伟大,但我也在为抗疫奋斗,我和儿子都很骄傲!”王晓溪说。3月底随着同事们陆续返岗,他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更重要的是,一切都在好转。现在我每天送的快件量恢复到130件左右,正常的生活又回来了。”

本报记者 金志刚